



## 公共性——儒家适应现代化需求的关键

(2005-6-29 10:33:45)

作者：方尔加

今日中国社会道德问题十分紧迫。2004年2月3日新浪网发表题为《安徽阜阳旧官场的“官德”沦丧群贪一一示众》一文，抨击阜阳地区党政干部贪官之多之恶劣。文章最后的小标题是“迫在眉睫的执政道德建设”，认为“执政道德是执政党治理国家、整合社会的伦理基础和道义基础，体现着执政党治理国家的道德水平。”其中还引述了受西方行政管理思想影响甚大的青年学者，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的观点。毛还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就指出官员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。他说，“恰当的制度建设是完善政府责任机构和动力结构的主要途径，但是，在技术上，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完全经济地解决官员的责任和动力问题。这时，就有必要加强政府职业道德建设，来弥补制度建设的不足。”类似的见解不仅中国有，法制最完备的美国也有。前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说过，“我们最迫切的问题不是由我们法律中的缺陷引起的，而是起因于应该支持法律的道德公识的分崩离析。总之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是一种道德危机。”（转引刘森林、杨向荣《公共生活与理性》载《新华文摘》1999年第八期第40页。）

以上执政者道德的危机其实渊源于全社会道德滑坡。社会道德是执政道德的基础。说我国社会道德正在发生“危机”一点也不为过。有关见危不济、见死不救、趁火打劫的事例不胜枚举。据新浪网2003年11月23日载：“都江堰，一个曾经因有着两千年历史的水利工程，有着一对勤劳智慧的父子而被人们所记住地方。而今天，这个地方再一次被人们想起、同样也会被记住，却是因为一位女子的不幸。一名弱女子在深夜，遇到歹徒的追杀，逃亡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，但整条大街的居民毫无反应，致使这名女子在绝望中被暴徒殴打致死。黑夜，小街，暴行。呼救，冷漠，伤逝。在那个血色清晨，一条街的良知都冻死了。”据新浪网2004年1月3日载：1月2日“下午3时10分，黄寺西口马路北侧近100米的机动车道和便道上，突然散落了许多面值50元的人民币，路过的人蜂拥而上，不到一分钟便将钱抢光。”这件事就发生在首都北京。类似事情在全国各地已发生多起。医生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是济生救命的菩萨，可今天的道德颓衰令人悲哀。《文摘报》2004年6月17日载文《就这样盘剥患者》。文中说：浙江瑞安市人民医院“在周边地区很有名，一是人民医院是这里最好的医院，该院的骨科更被认为是“浙江省县市级医院中最好的”。二是医院这两年轰轰烈烈地搞了“杀红包”活动，向社会公开承诺不接受病人的红包和礼物。然而医生集体收受回扣的串案还是发生了，骨科成了“重灾区”。2003年7月16日至9月5日，根据浙江省统一部署，瑞安市审计局对瑞安市人民医院2002年度财务状况进行就地审计。钢板和不锈钢螺丝钉是骨科常用的医疗器械，但是经销商卖给瑞安市人民医院的一套1万多元的骨科用钢板材料，审计人员6000多元就能买到。在实际使用中，瑞安市人民医院有的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和病人结算，而有的则是按套结算（通常是上肢一套，下肢一套）。螺丝钉一般要200元—2000元一个，医院有时会少用，而结算时却按正常使用向患者收钱。审计人员抽查了骨科几十份病历，同时调取X光片查看。”在X光片上，钢板和骨头、肉还是分得很清楚的。”一名审计人员说，结果让我们吃惊，少用螺丝钉的竟然高达10%—20%。比如患者丁某，7枚不锈钢螺丝钉，少安装了3枚。患者吕某，少安装了5枚。随着审计工作的深入，瑞安市人民医院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。”“记者调查了解到，这个寄生群体利用药品定价虚高，利润空间巨大的空子、黑箱操作，大肆榨取患者的血汗钱。以批发价100元一支的抗生素为例，其实际出厂价为15元，药商如果以7折（70元）卖给医院，药商的利润空间是70—15=55元，医院的利润是100—70+15=45元（15是国家规定的15%的零售加价率），药商要拿出25元给医药代表，医药代表再拿出15元给医生，诱惑医生多开药。药商所剩的30元的利润再拿出一部分进行医院的高层公关。表面上看，药品销售的环节是药厂、医药公司、医院、药房、患者，实际上，药品销售的环节是药商、医院、医药代表、大夫，多了一个医药代表。药商负责医院的高层公关，把药品打进医院；医药代表负责运作大夫，促销药品。这是药品流通的潜规则，而患者只有掏钱的份儿。”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社会未来最令人寄予希望的、也是青年人中的精英部分---大学生的整体道德水平出现滑坡。据新浪网2004年2月6日载：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，校园也出现了一类手机恶意欠费族，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恶意欠费，让电信部门防不胜防。他们的这种做法，也使他们自身遭受了严重的诚信危机。据2004年1月31日光明网载《近80分“抄袭报告”说明什么》一文：“湖北荆州师

范学院日前曝光了近80份具有明显抄袭痕迹的调查报告。其中大多是两篇文章雷同，雷同率最高的达5次。以《网吧带来的问题》为题的调查报告有5篇，并且都是打印文稿，除姓名、学号有别外，其他完全相同。一篇《大学生就业难的解决出路》的报告，在初评中已经被评为一等奖，后来经评委复评发现，此论文也是抄袭之作，不过手段略高明一点而已。”据2003年12月30日新浪网载《女生把耳机埋入长发听答案高校作弊风越刮越甚》一文：广西某高校学工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，虽然高校不断加强监考力度，但是大学生作弊手段也越来越高超。以往，大学生作弊的“常规手段”主要有偷看、翻书、夹带、传纸条、交头接耳等；近一两年，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也在考场派上了用场，学校曾现场查获一批用传呼机、手机作弊的学生。这名老师说，夹带是最常用的作弊手段，他前两天还抓到了一个作弊的学生，该学生在考卷下面铺了一层抄满密密麻麻答案的纸条，考试时总是假装翻看第二页考卷。事后，该学生“坦白”说这些纸条是他抄了一个星期才准备好的。老师苦笑说：“这个学生花那么多时间准备作弊，却不愿花时间认真复习。真令人搞不明白。”现在在高校雇枪手考试、撰写学位论文竟已然成为火暴的地下产业。据新浪网2003年12月26日载：“教育部紧急通知：坚决刹住高校考试作弊歪风”，说明该问题已严重到何种程度。

面对社会道德滑坡我们不能不作出深刻的反省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？中华民族道德传统悠久积累深厚，已为世界所公认。但是，笔者以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确有与现代化不相容的一面。这应被视为今日社会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以中国主流文化的代表儒家为例，公共性的缺乏是其道德理念致命弱点，梁启超曾对此反省道：“吾中国道德之发达，不可谓不早，虽然，偏于私德，而公德殆阙如。试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诸书，吾国民之木铎，而道德所从出也。其中所教，私德居十之九，而公德不及其一焉。”（《梁启超文选·论公德》上。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8月第110页）梁启超批评“旁观者”中的“混沌派”“不知有所谓世界，不知有所谓国，……户以内即其小天地，争一钱可以陨身命。”“旁观者”中的“为我派”“事之当办，彼非不知；国之将亡，彼非不知。虽然，办此事而有益于我，则我惟旁观而已；亡此国而无损于我，则我惟旁观而已。”梁启超引用了日本报纸的一段描写：“吾尝游辽东半岛，见其沿道人民，察其情态，彼等于国家存亡危机，如不自知者。彼等之待日本军队，不见为敌人，而见为商店之主顾客；彼等心目中不知有辽东半岛割归日本与否之问题，惟知有日本银色兑换补水几何之问题。”（《梁启超文选·呵旁观者文》上。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8月第258页、259页。）由于缺乏公德意识，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对国家之危难大都取旁观者态度。中国人“其为派不同，而其为旁观者则同。若是乎，吾中国四万万人，果无一非旁观者也；吾中国虽有四万万人，果无一主人也。”（《呵旁观者文》262页）鲁迅先生在许多文章里批评的“看客”亦属旁观者类。中国人公德意识的缺乏今日仍未有大的扭转。笔者甚至认为现在的情形比“旁观者”和“看客”更加可怕，“旁观者”和“看客”虽不主动捍卫公德，大多仍能独善其身。现在许多人认为独善其身吃亏，竟积极主动违反公德，出现“全民腐败”的可怕苗头。改变这种可怕状况的重要出路是造就公共道德意识。

为了加深对儒家道德缺乏公共性的理解，笔者将儒家道德和与之相反的古希腊的道德做一番比较。双方的可比性如下：第一，双方都处在古老文明的源头，属于原生性文化。第二，双方都生于“乱世”，长于忧患。儒家创于“礼崩乐坏”的无序时代；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雅典城邦“民主制”已走过伯力克里执政的“黄金时代”，出现危机。雅典“公民”因不事生产而日益贫困化，逐渐失去对“政治”的热情，而“公民大会”为“蛊惑家”所把持，凭着三寸不烂之舌，可以使朝令而夕改。“公民大会”已不是促使“无序”的“意见”走向“有序”的制衡，而是为“无序”火上加油，无法制定符合实际的可行性措施。“公民大会”作为一个政治实体，实际上已经瓦解。儒家与苏格拉底、亚里士多德等人一样都想变无序世界为有序，都探讨了秩序的合理性。第三，他们都关注现实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，又都遭遇挫折。孔子任过司寇、代理宰相。孔孟还周游列国，希求见用，但都被王者敬而远之。苏格拉底三次从军、当过公民大会的陪审官，但受到僭主的迫害，牺牲了性命。亚里士多德当过王者之师在雅典反马其顿运动中成为打击对象。第四，他们对人类文明有非常深远的影响。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第 5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